

蔣中正與葉公超的互動：權力、外交理念及信任的裂痕（1950-1961）

任育德

摘要

蔣中正在中日戰爭時期涉入中華民國外交事務及開闢第二軌外交管道，進行多邊外交。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仍欲進行多邊外交，卻受制於冷戰局勢，必須改採以美國為主的單邊外交，外交部長的人事異動就成為可觀察的政策指標。本文嘗試運用《蔣中正日記》對照相關人物日記，輔以檔案及其他史料，討論蔣中正與葉公超的互動合作或意見差異，並將其納入蔣中正、傾向政治自由派的學界人士，及陳誠等各方人際互動的角度思考，藉以理解蔣中正之主導外交人事變動，其實也和蔣中正和自由派學界的互動趨勢相呼應。

本文指出，蔣、葉雙方存在著鮮明政治理念與對美觀感的差異，當葉公超所代表的自由派學人期望維護中華民國政權，力主彈性親美政策，與蔣中正之利益及意向相符時，雙方可朝共同方向前進；但當蔣中正期望掙脫美國軍事外交管道控制，不惜走向孤立路線以求主導外交政策時，就會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彈性親美政策形成衝突，進而凸顯並放大雙方政治理念之歧異。當蔣中正覺得無須再予隱忍時，自由派學人退出政治一線活動的結局就不可避免。蔣中正主導葉公超的人事異動，除了反映其外交策略思路，也呈現出中華民國內部政治趨勢的縮影。

關鍵詞：蔣中正、顧維鈞、葉公超、陳誠、對美關係

Chiang Kai-shek and George Yeh: Power, Diplomacy, and the Erosion of Trust, 1950-1961

Yu-te Jen*

Abstrac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Chiang Kai-shek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diplomatic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and established personal diplomatic channels, pursuing multilateral diplomacy. After the ROC government relocated itself to Taiwan, it was unable to continue multilateral diplomatic efforts. Constrained by the Cold War, the ROC was compelled to adopt a primarily U.S.-centered approach to foreign relations. Personnel changes in diplomatic posts, particularly in the office of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were observable indicators of this policy shif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cooperation, and ideological divergences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George Yeh, who served as Foreign Minister (1949-58) and Ambassador to the U.S. (1958-61), by analyzing Chiang's diaries in conjunction with those of relevant figures, supplemented by archival materials and other historical sources. It incorporates the perspectives of Chiang Kai-shek, the liberal intellectuals (including Yeh) and Chen Cheng to elucidate Chiang's influence on diplomatic decisions, which also reflected the evolving dynamics between Chiang and liberal intellectual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ideology and percep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existed between Chiang and Yeh. When the interests and intentions of Chiang Kai-shek aligned with the liberal intellectuals' advocacy for a flexible pro-U.S. policy so as to safeguard the ROC regime, they could collaborate effectively. However, when Chiang sought to assert his own

*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control over foreign policy and break free from U.S.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control, even at the risk of leaving the ROC in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conflicts arose between him and the liberal intellectuals. Their divergent policy toward the U.S. accentuated their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Consequently, when Chiang Kai-shek deemed it unnecessary to maintain restraint, the inevitable outcome was the withdrawal of liberal intellectuals from front-line political activities. Chiang's orchestration of George Yeh's dismissal reflected both his strategic diplomatic thinking and the broader internal political trends in Taiwan.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Wellington Koo, George Yeh, Chen Cheng, US-Taiwan Relations

蔣中正與葉公超的互動：權力、外交理念 及信任的裂痕（1950-1961）^{*}

任育德^{**}

壹、前言

外交是國內政治的延伸。政治人事的任命既反映國內政治勢力的分布，也呈現執政者考量政策規畫執行、任務需要的綜合結果。外交政務首長的任命，由於外交事務涉及對國際政治的理解及應對，通曉外語自成外交首長必具的能力。葉公超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單一任期最久的外交部長，其任內簽訂《中日和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為冷戰時期中華民國對美外交維持穩定發展不遺餘力。葉公超擔任外交部長的時間，正逢蔣中正從二戰「四強」同盟國「勝利者」的權力頂峰，在4年時間內卻轉變為失去大陸治權；在官方檔案之外，如果能夠透過逐步公開出版的《蔣中正日記》以及同時代其他人記載有關蔣中正的內心處境與思路，當可更加凸顯人物的主觀角度與心境幽微之處。

當研究者閱讀日記，自須注意日記本身是帶有主觀性的紀錄。但是多方比對各種日記，也可理解人物背後所埋藏的人事背景、人際脈絡在相關政策決策、人

^{*} 本文初稿〈1950年代《蔣中正日記》中的對美關係決策與人事〉曾在國史館「戰後臺美關係——從經濟發展到國防安全學術討論會」研討會（2024年12月14日-15日）發表，經評論人劉維開教授建議後，修改為現名。針對諸位匿名評審人提供的寶貴閱讀意見、思考方向及參考資料，筆者深致謝忱。

收稿日期：2025年2月2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5年6月2日。

^{**} 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事更迭中扮演什麼作用，也將更為理解有關人物在其中的立場、互動，以及史事發展何以至此。湯晏、江勇振即曾注意到專家學人從政時的無奈與政治限制。¹

《蔣中正日記》在美國開放後，讓研究者得以逐步運用，探究有關蔣中正和外交人事、決策、宣傳論點的轉變，²這也是本文所能參用的重要史料。但由於日記本身出自單一視角，面對本文另一位主要人物——葉公超並無留下一手資料紀載可資對照，有可能流於單面論述、評價。因此，本文嘗試運用蔣中正及其他相關人物的日記，主要包括已出版之《陳誠日記》、未出版之〈蔣廷黻日記〉³等，輔以廣東籍外交前輩《傅秉常日記》中有關葉公超的紀載，進而配合與人物相關口述訪問、回憶錄、檔案，以反映相關人士眼中有關變化所代表的可能，以資平衡。

貳、臨危受命的外交部長

一、蔣中正和反共立場政治自由派學人的合作

蔣中正對中華民國外交事務的涉入及開闢第二軌外交管道，始自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受到美國扶植為「四強」，學習扮演大國角色，卻也因為相關經歷以及民族主義使然，對美國帶有愛恨交織的情結。觀察蔣中正從抗日戰爭起的外交

¹ 湯晏，《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臺北：衛城出版，2015年）；江勇振，《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年）。

² 王正華，〈蔣介石與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國史館館刊》，第19期（2009年3月），頁137-193；王正華，〈蔣介石與196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國史館館刊》，第21期（2009年9月），頁95-149；張淑雅，〈「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宣傳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2010年12月），頁1-49；黃淑薰，〈葉公超與劇變時期的中美關係（1949-1961）〉（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羅文婷，〈葉公超與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外交（1949-1961）〉（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³ 〈蔣廷黻日記〉現存1944-1965年，屬於美國哈佛大學「蔣廷黻檔案」的一部分，已在2025年2月由研究者張淑雅等人完成編校註解，納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提供外間檢索。

部長人事任命，會發覺蔣中正曾在1941年12月27日起，自兼10個月餘。其餘外交部長中，僅郭泰祺是職業外交官出身，宋子文甚至是蔣中正姻親，顯示部長任命的政治性意義。蔣中正嘗試同時運用多重管道試探、偏好軍人或官邸人士出任特使，以在外交管道外建立第二軌道，也反映在爭取軍械採購以及往後的外交運用上。⁴ 政治學者戴鴻超指出，蔣中正在戰時花費在外交上的心思遠超一般人想像得多，其以「遠交近攻」法進行聯盟，使中國居於不敗之地，再進而取得勝利。⁵ 這已顯示蔣中正欲掌握外交決策的雄心。

1946年初，身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中正，向軍政部長陳誠表示，因投注心力於戰後軍事剿共，已不易兼顧外交，然其言詞中仍流露出指導意向：「現外交、政治太忙，無法兼顧」、「外交不解決，不能談內政，對外交決不願用兵，尤不願第三次世界大戰以中國為戰場，但不得已時，要有死中求生之決心。」⁶ 1948年底，兼代外交部長的行政院副院長吳鐵城在接見美國合眾社記者時稱：新政府的內閣為戰時內閣，政府有堅定剿共決心，加強動員繼續戡亂。同時對外宣示，政府是為主義而戰，為維護《憲法》給予之自由民主而戰的立場。⁷ 12月27日，吳鐵城視察外交部，由次長劉師舜、葉公超代表交代業務，吳鐵城表示：「外交部將一任其舊，不予更張，外交部人事制度過去已有良好之規模，自當繼續維持，深望今後各同仁一本過去之服務精神，繼續努力。」⁸ 其言語流露出濃厚地

⁴ 李君山，〈抗戰前期國民政府軍火採購之研究（1937-1939）：以楊杰在俄法之工作為主線〉，《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2期（2014年11月），頁123。1952年《中日和約》簽訂前，蔣中正也派何應欽、董顯光赴日嘗試建立直接溝通管道，駐日代表團何世禮透過盟軍總部向日本施壓的努力也不可忽視。這顯示蔣中正一貫意圖建立美國高層直接溝通管道的手法操作。參見李戡，〈何世禮與《中日和約》的簽訂——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的角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9期（2018年5月），頁101-104、122-125。

⁵ 戴鴻超，《槍桿、筆桿和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15年），頁276。

⁶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1946年2月23日、3月16日，頁702。有關談話內容以《陳誠日記》記載為詳。

⁷ 《中央日報》，南京，1948年12月27日，版2。郭廷以記述為「政府決繼續作戰，至共黨乞和為止。」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頁818。

⁸ 《中央日報》，1948年12月28日，版2。

過渡意味。在機構播遷、駐外人員薪資遭逢積欠、扣減而人心浮動之際，駐美單位是靠著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調查、解雇、遞解出境共產黨及其同路人，方得以壓制躁動的基層團員。⁹ 透過美國國內反共政治路線的相關措施以穩定中華民國駐外官員，恰好反映出中華民國和美國的外交、政治有其連動關係。政治自由派學人面對國共之爭有不同抉擇，如羅隆基參與「民主同盟」，和國民黨對立；但像胡適、葉公超等政治自由派學人則在反共立場上與蔣中正取得共識，而得以和蔣中正進行合作，這就是筆者所言之反共政治自由派學人。在胡適給予蔣中正反共思想、路線的建議之外，¹⁰ 葉公超出掌外交部，成為反共的政治自由派學人從政重要指標之一。

檢視葉公超的經歷可知，葉氏家族在南方交遊廣闊，與廣東政界人士傅秉常等有鄉誼；葉公超本人有留美、英國資歷，返國後，先後於清華、北京大學任教，其和胡適一樣，屬於留學海外、在北京、清華等高等學府任教的「北方學人」。他曾密切參與新月社的活動，因其認同民主自由、改革的政治理念。1940年起葉公超開始投入政治活動，參與董顯光負責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簡稱國宣處）工作，遠離一線教育工作。王世杰就任外交部長後，調任葉公超回國，擔任外交部參事。1947年6月11日，葉公超升任常務次長。1949年1月18日，轉任政務次長，同年4月5日起代理部務，10月1日獲行政院長閻錫山同意真除部長。¹¹ 楊西崑指出，在政治方面，葉公超不是一般人概括認為的「孫科派」，而是屬於「自由派」。¹²

⁹ 江勇振，《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頁400-402。

¹⁰ 黃克武，〈胡適、蔣介石與1950年代反共抗俄論的形成〉，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第一冊：領袖的淬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頁647-666。

¹¹ 葉崇德，〈憶先兄葉公超〉，《傳記文學》，第55卷第6期（1989年12月），頁66-67；湯晏，《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頁235-244。參事任命見〈國民政府令——任命葉公超為外交部參事〉，《國民政府公報》，南京，第2781號（1947年3月24日），頁4。有關日期依據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https://gpost.lib.nccu.edu.tw/display.php?&q=葉公超>（2024/8/16點閱）。

¹² 楊西崑是葉公超在北京大學執教期間教過的學生。楊西崑口述，劉鳳翰、陳進金訪問，楊同慧記錄整理，《楊西崑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24年），頁121。

國史館典藏的《侍從室檔案》中，收藏一份有關葉公超的「考語」，內文中肯定葉公超的專業、是優秀的翻譯人才，同時也提到葉氏「洋化」，政治態度上對「黨無多認識」的情況：

葉恭綽之子【作者按：應為姪】，性情直爽，擅長英語，曾在國內大學任英語教授。對黨無多認識，一切洋化，言語交際、身體儀表都好，有外交之才，可稱洋務人員是也。原為董顯光所推薦，王雪艇訪英時亦加賞識。去年9月回國述職，究竟在英工作無多，現已仍去倫敦工作。¹³

如從葉公超有暱稱董顯光為「Uncle Holly」視之為父執輩之語，¹⁴ 有關考語在弄錯葉公超親族關係外，倒也顯示幾分葉公超的個人特質：深諳英語情境、性格直爽、言語無忌，雖為國民黨員，但對黨政人士並不親近，不屬於黨內任一派系。

1949年3月，葉公超預料李宗仁的議和策略難以成功，中共勢必會對南京發動軍事和政治攻勢，不過他也表明拒絕離棄政府與國民黨，¹⁵ 這透露他反共的政治觀點。同時，蔣中正的側近也建議其任命葉公超，此可被視作蔣中正正在內政上及外交人事方面皆意圖營造改革形象，以爭取美國的支持。葉公超諳熟外國語言與風俗民情，能夠協助對外溝通，因此，其任命對處於危急的政權而言，有其必要。持反共立場的政治自由派學人選擇「擁蔣反共」，而蔣中正也選擇與其合作，以營造改革形象，這體現了「道不同而相為謀」的政治現實。¹⁶ 至於雙方在民主路線與理念的選擇分歧則暫告擱置。

¹³ 〈葉公超〉，《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藏，典藏號：129-200000-3996。

¹⁴ 葉公超，〈懷念董顯光先生（選載）〉，《傳記文學》，第42卷第1期（1982年1月），頁39。

¹⁵ 傅秉常著，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民國三十七—三十八年》，1949年3月14日，頁283；秦賢次編輯，《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再版），頁113、125。

¹⁶ 建議出自沈昌煥，見〈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660-064；黃克武，〈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到「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國史館館刊》，第76期（2023年6月），頁158。

二、蔣、葉磨合例證：應對美國《白皮書》公布

1949年，中國內戰局勢不利於中華民國政府，美國開始重新評估對華政策。此時，蔣中正政府為攸關政權存續，亟需美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重建在二戰及內戰時遭受破壞的經濟。江勇振注意到，顧維鈞、胡適、蔣廷黻、宋子文等反共知美人士都曾在美國參與籌劃取得美援物資，蔣中正也在臺灣配合爭取美援。然而，蔣中正期待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直到韓戰進入停火談判後才取得。¹⁷ 因此，蔣中正表面說在乎道義援助，事實上並未忽略美援之爭取。他也願意讓這些反共知美者進行各方面的嘗試，期能「死中求生」。

美國國務院為了回應國內對其對華政策「袖手旁觀」的批評，開始籌備發表《對華白皮書》，旨在說明美國並未放棄中國。然而，該文件的附件中包含對蔣中正的負面批評，使蔣中正政府感到不安。後來，透過顧維鈞、宋子文等人與美方的接觸，判斷美國仍有可能提供軍援，因此，《白皮書》的發布可被解讀為一種「一邊批評，一邊示好」的策略。¹⁸ 不過，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白皮書》發表時的聲明，仍是讓國民黨對美國的意圖產生猜忌；中共方面，毛澤東也發表〈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等5篇文章，表示強烈不滿。¹⁹

1949年8月7日到15日，國民黨內部討論如何應對，態度審慎卻存在分歧。是年8月7日，《中央日報》的社論〈評美國國務院白皮書〉稱，美國過於天真，並未認識中共本質；政府「過份順從美國政策，本身也犯了一個錯誤。」²⁰ 蔣中正身為國民黨總裁，內心認為《白皮書》的發布是「新國恥」，在會議中難抑其

¹⁷ 江勇振，《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頁406-415。

¹⁸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7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209-210、212；〈對美關係（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02-203。黃仁霖稱其透過管道取得樣書，奉宋美齡命親赴臺北交與蔣中正。見黃仁霖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黃仁霖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頁177。

¹⁹ 《中央日報》，1949年8月6日，版1；林博文，《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09年），頁130。

²⁰ 《中央日報》，1949年8月7日，版2。

激動情緒，致使發言「粗漫無次。甚覺自慚」。12日的臺北會議有張其昀、吳國楨、王世杰、沈昌煥、吳忠信在座。會中諸人「各有意見」，蔣中正、吳忠信與吳國楨都傾向慎重。²¹ 蔣中正夾在這些利益、尊嚴情緒衝突中，自知「兇險」，在《日記》中書寫忍耐、等待時機等箴言以提醒克制。8月13日，蔣中正發表談話，主張「自力更生」、「獨立奮鬥」，打破依賴美援的心理。8月15日，蔣中正對回應做出定調：「總不予美國朝野仍以我有求援示弱之意也」。²²

8月7日，外交部代理部長葉公超發函指出，《白皮書》內容矛盾甚多，「自將招致各方攻擊」。²³ 8月7-12日，國民黨廣州非常委員會談話會、正式會議討論3小時，據稱有「具體決議」，但未如報載所稱在13日發表。甚至當時《中央日報》載，王世杰等奉「有關方面」命令研究有關回應，決定後將交代理部長葉公超攜返廣州，經行政院通過後發表，答覆全文約兩千字的報導。²⁴ 這不排除蔣中正顯然有為一次說明、以期維護個人尊嚴在作準備。不過到最後一刻，蔣顯然改變主意。8月15日，蔣中正讓周宏濤發出電報，改以日後將出白皮書及回憶錄以資表明事實真相，並請葉公超言明要取同一論調進行宣傳。²⁵

蔣中正在臺北擬出一份提示要點及文稿，供廣州非常委員會討論。8月15日，葉公超自臺北返回廣州。16日，葉公超列席國民黨非常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該會決議：「照總裁草定之初稿通過，送請閻院長交政務會議通過發表」，隨即由葉公超發布政府書面聲明。原議葉公超應準備詳盡聲明於短期內發表，未見實施。

²¹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9）》（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1949年8月11-12日，頁242；吳忠信著，王文隆主編，《吳忠信日記（1949）》（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年），1949年8月12日，頁110。

²²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9）》，1949年8月14-15日，雜錄1949年8月11、14日，頁245-246、407；〈革命文獻——美政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經過〉，《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400-00047-034。

²³ 《中央日報》，1949年8月7日，版1；〈革命文獻——美政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經過〉，《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400-00047-019。

²⁴ 《中央日報》，1949年8月8、13日，版1。有關兩千餘字文件，篇幅較貼近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所存聲明稿初稿，全文見〈革命文獻——美政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經過〉，《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400-00047-037。

²⁵ 〈對美關係（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06-256。

16日政府僅簡短聲明反對《白皮書》的觀點，「但不願陷入對過去的爭論，以免有傷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中國政府在適當時期另將持有觀點及相關事實詳切聲明，以期使雙方人民更有瞭解。²⁶ 這份330字的正式書面聲明將蔣中正的提示要點完全囊括，大異於《中央日報》所稱的兩千餘字稿版，但和顧維鈞的立場相應和。引起顧維鈞注意的是，政府在正式聲明中隱含著「過於溫和」以及有意釋出「含混其詞」的政治訊號。²⁷ 蔣中正自評其立場「嚴正不屈」，然而他在《日記》中堅持美方「有頭無尾，輕諾寡信」的觀點，²⁸ 和現實言論之間的落差，頗耐人尋味。

蔣中正顯然是考量「不傷害友誼」的實利，而選擇「不爭論過去」，並接受外交人士運用外交話術——「禮貌又模糊」、「展望未來」的建議，以等待可能的轉機。1949年10月，葉公超正式出任部長後，立即列席遷至廣州的立法院，給立法委員留下「表演很不錯」的印象，對立委質詢「答覆極為有力」。²⁹ 葉公超臨危受命下的登場，協助政府向美國釋出善意，爭取美國的信心和援助，自有作用。

有關政治及外交操作都顯示，蔣中正在內外交困、被動配合的情勢中（日後自稱「容忍」³⁰），以爭取美援為優先，眾僚屬為輔，採取靈活的外交策略相助成事。蔣一方面對美國的批評表示不滿，另一方面又釋放善意，避免與美國關係破裂。葉公超等人則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協助蔣中正達成外交目標。葉公超在其中的出力輔助、穿梭協調實績，實不可忽視。這段歷史也體現：在複雜的國際形勢下，弱國為求生存和發展，不得不進行權衡和妥協的現實。

²⁶ 決議內容見陳鵬仁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頁37；新聞報導見《中央日報》，1949年8月16、17日，版1、1。

²⁷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7分冊》，頁225。

²⁸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49）》，1949年8月20日上星期後反省錄、8月17日，頁251、247。

²⁹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1949年10月4日，頁1268。

³⁰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1）》（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1951年6月16日後上星期反省錄，頁170。

叁、蔣、葉為反共而合作，也為對美尺度有衝突

一、強權政治下的外交困境

戴鴻超指出，從1950年代起，中華民國面臨國際現實的強權政治，在外交政策上幾乎完全依賴美國而定行止，不得不改變戰時運用「多邊外交」的機會，以聯合一個強權，對付另一個強權的做法。³¹ 蔣中正內心對此國際環境深有不甘，卻得在事實上接受美國在國際關係給予的「指導」及相伴的「壓力」，以維繫政權。但是，蔣中正個人具有濃厚的挑戰意識，如曾有人向他建議改變「復古」之語，以新術語解說舊名詞，激起蔣中正的挑戰意識，回稱：「我不說，他人更不敢說，我必如此說。」³² 在國內外現實和個人情感之間的落差激盪下，觀察蔣中正、葉公超在權力位階不對等下的互動，可發現二人雖皆反共並認同且實際與美合作，但在細節做法、策略上，確實存在衝突。

1949-1950年代前期，外交部長葉公超和駐美大使顧維鈞、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緊密聯繫及合作，以維護中華民國有關國際權益，時常在信件、餐會中交換有關外交部官員的人事意見。³³ 顧維鈞指出，在臺灣內部，1950-1953年間擔任總統府秘書長的王世杰非常關切外交事務，往往在和外交部長商議前，便採取行動；1954年5月就任秘書長的張羣，則寧願將所有問題提請外交部「指點」。³⁴ 王、張二人作風的差異不僅對葉公超在推動事務所獲得的助力產生影響，也影響到葉公超和蔣中正之間就政策探討意見瞭解度、表達方式的應對。蔣中正雖然認可辦外

³¹ 戴鴻超，《槍桿、筆桿和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頁280。

³² 熊式輝著，林美莉校註，《熊式輝日記（1931-193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2年），1939年3月15日，頁296。

³³ 蔣廷黻著，張淑雅等編校，〈蔣廷黻日記/1952-08-21〉、〈蔣廷黻日記/1954-12-16〉、〈蔣廷黻日記/1955-01-01〉，均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蔣廷黻日記>（2024/8/22點閱）；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7分冊》，頁198。

³⁴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11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277。

交者要懂外交及國際事務，如同西餐應由西廚烹煮的評論，³⁵ 但當蔣中正期望施展多邊外交以運作討價還價空間，卻受迫於美方事前未向華盛頓大使館及臺北外交部方面通知、商討、直接單方面發號命令，再碰上外交部長若是以美國「試圖約束蔣中正動武」為前提，研判及傳達美國訊息，不僅會讓蔣中正內心感到矛盾與受挫，也讓葉公超感受到工作上的困難。³⁶ 蔣中正有時會尊重外交部，但未必完全認同外交部門傳達、研判美方的不同意見，因此會透過書寫《日記》，宣洩不便公開表示的情緒。這很可能是《日記》裡，很少看見他有肯定外交官作為的文字，反而出現較多的抱怨文字根源。以下就從1950年6到7月間，有關韓戰爆發之初、針對美方杜魯門總統聲明的回應，來觀察蔣、葉的互動。

1950年6月，中華民國政府終於等到美國的外交表態，派遣海軍阻止共黨對臺可能的攻擊，也要求中華民國停止對中國沿海與沿海領水內的軍事行動，但未事前告知臺北外交部有關行動。蔣中正在6月28日見到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聲明中有「至於臺灣未來地位，應待太平洋區域安全恢復後，與日本成立和約時再予討論，或由聯合國予以考慮」一節，立即認為「對我臺灣主權地位無視」，與海、空軍不能進攻沿海及陸地領土，「視我一如殖民地之不若，痛辱盍極。」因此，召集相關人士在總統府內研討對美聲明與（備忘錄）來電，「決以臺灣地位以及我反共抗俄與中國領土完整之立場，不能因任何情勢而動搖之意為回覆基點」。³⁷ 可見蔣中正相當不滿杜魯門聲明中關於「臺灣未來地位應待太平洋區域安全恢復後再予討論」的措辭，認為此舉無視中華民國在臺灣的主權地位。但他仍然同意暫停海、空軍對大陸攻擊，這反映出他的理解及處置順序，係以先配合美國於6月27日第93號備忘錄中表達的軍事行動意向為主。接著，蔣再「令外交部對美抗議」。³⁸ 稍後，蔣中正也向私人軍事顧問柯克（Charles M. Cooke）表示

³⁵ 吳忠信著，王文隆主編，《吳忠信日記（195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年），1950年7月21日，頁76。

³⁶ 顧維鈞，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9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658。

³⁷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0）》（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1950年6月28日，頁189-190。

³⁸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0）》，1950年6月29日，頁190。

抗議，並「屬其轉告麥帥也」，另一併商討派軍赴韓參戰事。³⁹ 美國總統顧問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後來也建議美國政府，向國會正式提出有關諮文時，儘量修整文字內容及語氣，以減少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彈。⁴⁰

顧維鈞在《回憶錄》道出，正是外交部門葉公超主動參與勸說，使蔣打消抗議念頭，回歸美方提出的備忘錄內容進行策略思考。這顯示葉公超在其中確實扮演調節性的樞紐。顧維鈞指出，葉打電話告知蔣，希望他協同蔣廷黻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控蘇案」，指明蘇聯才是造成北韓入侵南韓的真正侵略者。顧表達反對意見。此後，顧亦參與臺北方面有關如何答復杜魯門聲明的討論。顧、蔣都提醒，在杜魯門表面談話的不友善用詞中，國務院的處理方向事實上已經改變。⁴¹ 因此，即便蔣中正感到不悅，政府的對外發言最好還是採取「低調態度」（soft pedal）。而顧維鈞的建議，也是透過葉公超來轉達。⁴²

同日晚上，葉公超從臺北打電話給顧維鈞，表示蔣中正完全同意顧有關美國對華政策新聲明的觀感。葉順道提及，美國駐臺北代辦師樞安（Robert Strong）已提交6月27日第93號備忘錄，內容是由他本人翻譯為中文報呈。政府內部已就如何回應備忘錄討論數小時。顧維鈞表示，他第一時間反應是前往國務院詢問相關含意，後來決定「別再為難國務院」。⁴³ 顧維鈞事後回憶指出，葉公超最初的

³⁹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0）》，1950年6月30日、1950年6月30日後上月反省錄，頁191、193。

⁴⁰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8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67。

⁴¹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8分冊》，頁7-9；蔣廷黻的記載和顧維鈞敘述吻合，見蔣廷黻著，張淑雅等編校，〈蔣廷黻日記/1950-06-26〉、〈蔣廷黻日記/1950-06-27〉，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蔣廷黻日記（2024/12/21點閱）>；杜魯門聲明見“Editorial’s Note”，in Department of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as FRUS), 1950,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 367.

⁴²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8分冊》，頁9-10；蔣廷黻著，張淑雅等編校，〈蔣廷黻日記/1950-06-28〉，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蔣廷黻日記（2024/12/21點閱）>。

⁴³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8分冊》，頁10-11；蔣

公開評論聲明未必妥當，但在6月28日發表的政府正式聲明全文「則是恰當的，也是較好的。」按中華民國在正式聲明中表示：（一）與美國共同承擔保衛臺灣責任；（二）我政府主張「開羅宣言」預期的臺灣地位，任何方面都不應影響中國對臺灣擁有的權力；（三）杜魯門有關聲明是針對韓國情況的緊急措施。如遏制共產主義擴散措施無效，我政府將不得不協同有關國家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以抵擋侵略；（四）我國「無意背離抵抗共產主義侵略及維護中國領土完整這一雙重意義的政策」。⁴⁴ 這份完整備忘錄，於6月28日當晚由葉公超交師樞安，再電陳美國國務院。⁴⁵ 聲明中的第一、第四點都是正式回應美方，表明會與美方合作，且會為配合維護亞太區域的和平穩定並以中國、臺灣民眾的未來自由與福祉為目標。第二點則是呼應蔣中正的立場，強調中華民國對臺灣的主權態度，希望杜絕外間臆測，顯示外交部門和蔣中正對於發表正式聲明的態度相當審慎及再三研商。

中華民國政府在備忘錄中強調，金、馬、大陳等外島是臺灣防衛體系的一部分，希望美國第七艦隊將其納入防衛範圍，並建議雙方就此進行協商。美國師樞安口頭向葉公超表示，若中共攻擊臺、澎以外的島嶼，美國將不予防衛，但不會妨礙中華民國政府在這些島嶼上的防衛作戰行動。葉公超代表中華民國政府重申不主動進行軍事行動、不攻擊公海船隻的承諾，但也強調會在金門採取有效自衛措施或以海空武力支援地面守軍。⁴⁶ 有關美、臺雙方對於金、馬等外島的協防問題，即便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仍是爭論重點。

在《日記》只言開會兩次，未言參與者有誰。報載參與會商者，包括陳誠、葉公超、王寵惠、于右任、何應欽、張群、吳鐵城、周至柔、郭寄嶠、桂永清等人。《中央日報》，1950年6月29日，版1；師樞安提交備忘錄英文，見“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China”，June 27, 1950, in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50,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7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 188. 備忘錄中文譯稿見〈對美國外交（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6-00031-003。

⁴⁴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8分冊》，頁12-13；聲明全文見《中央日報》，1950年6月29日，版1；吳忠信指出，總統府會議眾人決定「婉復」美國，見吳忠信著，王文隆主編，《吳忠信日記（1950）》，1950年6月28日，頁67。

⁴⁵ 中華民國6月28日備忘錄中、英文版文件見於〈對美國外交（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6-00031-003。

⁴⁶ 美國口頭聲明、中華民國口頭答覆中文全文見〈對美國外交（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6-00031-003。

1950年中旬，中華民國空軍在公海射擊英國商船導致傷亡，葉公超提醒蔣中正政府注意先前的承諾，以免遭到美、英指責。然而，此舉卻被蔣中正斥責為「膽小」。⁴⁷ 這顯示蔣中正內心重視維護「國家尊嚴」，有時甚至凌駕於實際的外交考量。1950年9月，在聯合國一度討論是否要派遣調查團來臺時，蔣中正力主使用否決權，態度強硬，即使行政院長陳誠勸阻，也無法改變蔣的決定。葉公超對於行使否決權也持反對的意見，更因此惹惱蔣中正。蔣認為，行使否決權是「自衛」，與蘇聯藉此「侵略他國」不同，因此在《日記》中一度批評蔣廷黻、顧維鈞的來電是「偏解」，認為「外交職業家」是「害國非尠」。⁴⁸ 但蔣經過冷靜思考後，仍透過葉公超反覆和顧維鈞溝通、確認美國意向，再由臺北方面協議方案，表達願意配合美國而行動。⁴⁹

上述過程顯示，葉公超、顧維鈞彼此合作、溝通、交換意見，若再獲得陳誠、王世杰表示認同，向蔣中正表達意見與建議方案之後，確實可以緩解蔣中正最初的強硬態度。在美國主導的防衛體系秩序下，蔣中正和外交部門就有機會掌握到美國政策轉折的關鍵處，並能理性考量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將採取何種動向。當然，美國在東亞的介入程度加深，對中華民國外交動向的影響也更形加強。

二、長官注重忠誠而培養自己人

蔣中正、葉公超之間的互動既然有合作、有緊張，也就影響葉公超的在任與否。早在1951年，蔣中正就動念要進行外交人事整頓，但蔣也心知屬意人選蔣廷黻「其行其性不適於革命政治生活」，以及蔣廷黻表明不願回臺而中輟。事實上，蔣廷黻心中唯一能接受的職務選項，就是「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代

⁴⁷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0）》，1950年7月17日，頁211。

⁴⁸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0）》，1950年9月2、5、7、15日，頁255、258-259、265。

⁴⁹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8分冊》，頁170-171、188-189。

表」。⁵⁰ 因此，蔣中正最後選擇維持現狀。

陳誠日後道破蔣中正心中想法，那就是「並望能由常見面的幹部來擔任」外交、軍事、宣傳單位主管。⁵¹ 蔣中正已將外交、軍事、宣傳方面的主管與督導視為自己的權責，因此，「常見面的幹部」就必須是「信得過」的人。當蔣中正慨嘆「外交人才難得而且難養」，正顯示他更在意的是人才「養成」；「養成」又涉及蔣向來在意的「儒家化」政治思想——從注重個人修身，到忠於領袖、國家，最終成為「世界上頂天立地之人」、「富強康樂之國家」。⁵² 蔣中正的「儒家化」政治思想落實在用人面，就表現為要「信得過」。蔣中正過往透過各類短期培訓系統、學校、革命實踐研究院，灌注政治課程訓練，以培養「信得過」的人，落實其理想中的人才養成方式。因此有學者稱為「蔣介石學校」。但是，外交部門核心成員自顧維鈞以下，再到葉公超、蔣廷黻等人，均出身美國高等學府、重視專業。對蔣中正而言，這些外交成員畢竟是爭取成功而得給予禮敬的「客卿」，並非可以使喚的「學生」，最終得有自己的學生才較為聽話與放心。但從葉公超據說曾私下向陳誠建議停辦成為做官「終南捷徑」的革命實踐研究院言，⁵³ 這正好凸顯了蔣、葉在外交人員任用上的觀念差異。

1953年底，蔣中正正在追查「兩航案」期間，曾在盛怒下痛斥葉公超與嚴家淦，導致葉公超一度無法出席蔣親自主持的外賓宴會。事後，蔣中正主動召見葉公超，表示當時有所誤會。葉公超事後低調表示：「洗耳恭聽，沒說什麼

⁵⁰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1）》，1951年1月6日、3月22日、5月5日，頁20、92、133；蔣廷黻著，張淑雅等編校，〈蔣廷黻日記/1951-03-25〉、〈蔣廷黻日記/1951-05-31〉、〈蔣廷黻日記/1951-06-21〉、〈蔣廷黻日記/1952-02-27〉，均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蔣廷黻日記>（2024/8/24點閱）；蔣廷黻的理由有二：一是不確定在臺北的發揮是否能大於紐約，二是不希望原配唐玉瑞赴臺。

⁵¹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頁329。

⁵² 〈總裁革命理論與實踐（四）〉，《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301-00171-001。

⁵³ 張瑞德、馮啟宏，《蔣介石的人才庫與現代中國的命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4年），頁273、283、315；秦賢次編輯，《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頁259。

話」。⁵⁴ 蔣一度考慮由顧維鈞或董顯光接任外長，⁵⁵ 但躊躇未決，可能關鍵在於董對中國問題不甚熟悉，⁵⁶ 又無外交部相關人事淵源，恐無法駕馭外交系統的人事運作。1954年內閣改組期間，董顯光留在臺北「待命」，俟人事案底定後，始返東京任所。⁵⁷ 上述跡象顯示，當時有關人事異動的傳聞並非空穴來風。這也可解釋，為何葉公超在1954年俞鴻鈞內閣改組時，會推舉董顯光接任外長以自代；⁵⁸ 同年6月下旬，他更以未能促使菲律賓公平處理在菲華人國籍案為由，主動請辭以示負責。⁵⁹ 雖然最終在行政院長俞鴻鈞慰留下續任，這一連串動作反映葉公超對外交部長的政治角色瞭然於心，也展現他不戀棧的態度。

另一方面，沈昌煥成為蔣中正在外交人事布局中的一枚活棋。沈的外交資歷始於擔任外交部專員，1942年12月20日進入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受訓，並於1943年1月24日結訓。1944年歸建外交部，隔年進入國民政府主席辦公室工作。1948年4月起，出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間擔任新聞局長。1950至1952年中國國民黨實施「改造」期間，沈位列中央改造委員會成員。研究者指出，沈昌煥的個人特質之一是「為人低調」。⁶⁰ 忠誠與否、是否常受蔣中正召見都是蔣中正用人重要指標，蔣讓受過黨政訓練、親眼考察過的沈擔任政務次長以先行熟悉外交部政務運作，自是蔣在外交人事上「讓時間來決定」的實際做法。葉公超對沈昌煥則採取信賴與授權的方式，⁶¹ 二人關係尚稱和睦。不

⁵⁴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一）》，頁246、253。

⁵⁵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3）》，民國四十二年大事預定表，10月30日、11月11日，頁6、298、311。

⁵⁶ 〈董顯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典藏號：129-200000-3461。

⁵⁷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11分冊》，頁223。

⁵⁸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一）》，頁270、278、291。

⁵⁹ 《戰後臺灣歷史年表——網路版》：<https://twstudy.iis.sinica.edu.tw/Twht/General/MPeopleTwht.php?People=葉公超>（2024/10/26點閱）。

⁶⁰ 有關經歷詳見王文隆編輯，《沈昌煥先生年譜簡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3年），頁15-18、25-28、39；王文隆，〈沈昌煥與中法斷交（1963-1964）〉，收入中國近代史學會主編，《老臣謀國：紀念沈昌煥先生逝世20周年研討會實錄》（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9年），頁194。

⁶¹ 秦賢次編輯，《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頁116。

過，蔣夢麟也預見，沈昌煥很有可能當上外交部長。⁶² 這項政治觀察，在1960年蔣中正三連任總統後成真。

三、翻譯者葉公超面臨的信任危機

王宏志在研究英國馬戛爾尼使團（Macartney Embassy）現存往來文書的翻譯史時指出，無論翻譯是否忠實、準確，其本身都必然存在，且會左右外交進程。⁶³ 這讓我們意識到，在外交互動中，語言理解扮演了關鍵角色。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針對同一個案，首先指出翻譯在外交場合中的不可或缺性，並進一步運用社會學者齊梅爾（Georg Simmel）的「三元體」（triad）觀點，分析翻譯者所面臨的「危險」處境。由於翻譯者居間協調，瞭解異國習俗、文化，往往以「同理」態度化解談話中的激情成分，以求調和。然而，這可能會使各方在不瞭解翻譯者內心朝什麼方向搖擺時，猜疑翻譯者。⁶⁴ 筆者以為，沈艾娣針對翻譯者所處危險位置的解析，有助於理解蔣中正與葉公超之間的衝突。

中央社社長曾虛白曾形容葉公超，在外交場合能展現學者風範的英國紳士氣度，在宣傳場合也能因應對象調整自身角色。⁶⁵ 這正好反映出葉公超憑藉優異的語言能力、對風俗文化的熟悉，以及查證事實的能力，展現出對外人與外交事務的「共情」，進而實踐外交目標。但此種行事風格卻未必能與蔣中正產生「共情」，甚至可能因此引發蔣對他的信任危機。

⁶² 蔣夢麟當時是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委員兼主任委員，也是北方學人之一。他批評沈肅淺又是蔣中正的「應聲蟲」。蔣廷黻著，張淑雅等編校，〈蔣廷黻日記/1955-10-01〉，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蔣廷黻日記>（2024/8/24點閱）。

⁶³ 王宏志，《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年），頁418。

⁶⁴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著，趙妍杰譯，《翻譯的危險：清代中國與大英帝國之間兩位譯者的非凡人生》（*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24年），頁31、137。

⁶⁵ 秦賢次編輯，《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頁108。

1950年代，美國對臺政策從原先的臺澎中立化構想，轉為協助國軍發展及加強防衛實力，將臺灣及澎湖視為其在東亞的「軍事預備隊」（military reserve）。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也呈報，葉公超等人已注意，並伺機向來訪美國政治人物呼籲雙方簽訂防禦條約。⁶⁶ 駐美外交官也評估，美國從杜魯門到艾森豪，都認為臺灣是遠東爆發潛在危機和糾紛的主要區域，美國能穩定遠東安定的時間是越長越好，簽約就可確保其在東亞環太平洋周邊的利益範圍。⁶⁷ 美國最終確實透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取得限制蔣中正日後反攻大陸的法律依據，⁶⁸ 藉以維繫區域和平。

葉公超在談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期間，扮演重要溝通、執行者。他以具名發電的方式報告談判進度，再由次長沈昌煥轉呈蔣中正。起初，若有電報直接發給蔣中正，則由外交部向總統府索取抄件。後續則改為需要蔣中正過目的電報直發總統府，再由總統府抄轉外交部。⁶⁹ 此舉顯示蔣中正高度關注、掌控談判過程、篩選訊息及執行管道。有關研究指出，蔣中正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是該條約的主要決策者，顧維鈞與葉公超則是政策執行者。該條約不僅具有重大的政治宣示意義，反映美國在東亞推展「圍堵政策」成果，也成為冷戰期間臺灣抵禦中共進犯的重要保障。⁷⁰

然而，在中華民國與美國的互動過程中，蔣中正與葉公超之間雖有反共共識，蔣卻漸對葉產生歧異與不信任感。諸如戴鴻超觀察到，面對美方的主導，蔣中正並非展現強勢姿態，而是強調臺灣面臨強敵威脅的「弱勢」，藉此爭取美

⁶⁶ “Statement of Policy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ovember 6, 1953) and “The Ambassado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anki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8, 1953),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FRUS*, 1952-1954, Part 1, China and Japan, vol. 14,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p. 318, 333.

⁶⁷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11分冊》，頁432。

⁶⁸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衛城出版，2011年），頁222-225；林正義，〈「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其對蔣介石總統反攻大陸政策的限制〉，《國史館館刊》，第47期（2016年3月），頁129。

⁶⁹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11分冊》，頁402-403。

⁷⁰ 張淑雅，〈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一九五〇年代中美結盟過程之探討〉，《歐美研究》，第24卷第2期（1994年6月），頁51-99。

國的支援，最終透過國會通過「福爾摩沙決議案」，授權總統決定防禦金馬外島。⁷¹

葉公超在談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期間，曾為臺灣翻譯條文稿版本辯護，反對美國要求由其「中文專家」審閱；顧維鈞也補充表示，談判代表會對文字正確性全權負責記載。⁷² 1954年，美國中情局已評估，中共可能會對大陳、馬祖採取行動，大陳將面臨難以防守的問題。1955年，美國建議中華民國撤離駐防在浙江外海的大陳島，蔣中正決定發表聲明，有關內容經美國國務院一方律師建議，將「經與美國政府會商」修改為「及時通知美國政府」，意謂著大陳撤軍是蔣中正做的決定，美國僅是被告知。⁷³ 這引發蔣中正對美國的不滿，認為受騙。在美方派遣官員饒勃森（Walter Robertson）、雷德福（Arthur Radford）來臺遊說撤離金馬外島，蔣中正更直接拒絕，並以強硬態度——由宋美齡代為送客，來表示抗議。蔣稱「不屑與之作別決〔訣〕」並要葉公超告知饒勃森：「此來談話使命不可公開發表，以免共匪即來轟炸金馬」。⁷⁴ 美臺兩方進行會談期間的紀錄人沈錡注意到，蔣中正情緒甚為激動，葉公超翻譯時「已多加潤飾，但是口氣還是很

⁷¹ 戴鴻超，〈槍桿、筆桿和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頁286；林正義，〈「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其對蔣介石總統反攻大陸政策的限制〉，《國史館館刊》，第47期（2016年3月），頁124。

⁷²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11分冊》，頁462-46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McConaughy),” (November 23, 1954),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FRUS*, 1952-1954, Part 1, China and Japan, Vol. 14, p. 928.

⁷³ 廖文碩編輯，〈中央情報局有關中國離岸島嶼局勢評估〉（1954年9月8日），《美國國家安全與對臺政策檔案選譯（一）：杜魯門至艾森豪時期（1947-1961）》（臺北：國史館，2023年），頁313-316；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12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82；林正義，〈「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其對蔣介石總統反攻大陸政策的限制〉，《國史館館刊》，第47期（2016年3月），頁136。

⁷⁴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5）》（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1955年4月25-27日，頁113-115；沈錡指出，宋美齡和蔣中正商量後，要葉公超向美國攤牌，稱將公開所有交涉文件。葉公超考慮後，認為此策略後果不堪設想，才改說希望饒勃森守密話語。葉在事後據實報告蔣中正有關處理流程，得以無事。葉公超自認「避免一場危機」。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一）》，頁329。

硬。」⁷⁵ 這種舉動展現出葉公超秉持專業的立場，努力維護臺灣的利益。前述事件也反映葉公超的工作態度，他在翻譯、傳達時會努力兼顧雙方情緒，並以靈活手段協助蔣中正，以維護臺灣利益。然而，蔣中正對於《中美共同防禦協定》帶來的限制感到不滿，並將矛頭指向葉公超及其背後隱含的美國影響力，加深兩人之間在外交策略與政治意見上的分歧。宋美齡的表現恰好顯示與蔣中正之間的「共情」，更易得到蔣的讚許。

1955年底，在討論外蒙古加入聯合國的議題時，蔣中正主張動用否決權，認為如「侮辱過甚，則隨時可以自動退出也」，以「革命立場」言，聯合國代表僅為反共象徵，不可以當下無力量即等同為無地位。蔣思及1949年前後美國政策反覆往事，決心告知藍欽有關態度。蔣、藍談話後，蔣在《日記》稱透露對葉的翻譯保留言語不以為然：「本日談話幸妻參加，凡公超所不敢譯者，皆從傍補正無遺，而以毫無所求，並指美此種中立政策，將為其最大失敗之種因也，為談話之重點。」「自覺心安理得，甚感窮理知本則知止，集氣養氣則有定之格言，對我修養補益之大也。」⁷⁶ 蔣中正批評葉公超的「不敢譯」，其實反映出蔣、宋夫妻間的「共情」表現，讓宋美齡度過執政者對翻譯者的信任危機；葉公超由於展現出對美國更為「共情」的表現，反而加深執政者對翻譯者的信任危機，進而懷疑其行動。當葉公超不在國內，蔣中正元旦文告的英文版翻譯與審核自然成為宋美齡的不二職責，蔣中正更感謝愛妻的大力支持。⁷⁷ 葉、宋均受美國教育薰陶，但蔣中正在主觀上明顯更信任宋美齡的「翻譯」及「行動」，正由於二人之間有親密的私人關係。葉公超是學者從政，自有其矜持、身段，與蔣不具鄉、學緣，在反共理念基礎下，二人互動係以公務為主，未涉私情。再從後來蔣中正對高級將領的對外交涉要領「對外員切不可賣智弄巧，與其賣智自誇，不如裝愚示拙也」中⁷⁸，不難發現蔣中正對葉公超的「信任危機」日益加深，是最終導致葉公超在

⁷⁵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一）》，頁327。

⁷⁶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5）》，1955年9月11日、12月7-9日，頁245、322-323。

⁷⁷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5）》，1955年1月1日後上星期反省錄，頁9。

⁷⁸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6）》（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

1961年底離職的根由。

葉公超、蔣廷黻等自學界出身者的留美學人，支持蔣中正的反共立場，但有不同的政治理念。他們希望透過蔣中正同意推動的「廣案」，在國際社會實施軟性宣傳，以營造中華民國的正面形象。⁷⁹ 他們也注意到，若不斷強調軍事反攻，反而會引起國際社會的疑慮。1954年7月27日，葉公超上呈公文，提出強調臺灣人支持政策的具體建議：

我國在宣傳上似應盡量宣傳臺灣人參加軍隊之熱誠〔忱〕，且應多攝製宣傳品（如照片或電影）送往國外宣傳，同時軍用文宣可酌用臺籍人員。事實上臺灣同胞能參加作戰至何種程度，係另一問題，惟對外宣傳上，不能不重視臺灣同胞之積極參加作戰準備也。⁸⁰

1955年中，蔣廷黻也向次長沈昌煥表示，政府當階段以反攻作為維繫軍隊士氣的重點之一，但政府將面臨一波國際關係的安靜期，而不可能反攻，因此需要建構其他重點予以支持。⁸¹ 中華民國政府此後陸續邀訪美國人士、制訂宣傳計畫，並從1957年起開始聘用美國公關公司進行對美宣傳，以擴大宣傳效果，自是為爭取國家形象與存在能見度提供一定作用，⁸² 彰顯葉公超、蔣廷黻趨向「民主反共」面。他們也從實務工作中發現，「總統、院長的對外演說不宜過多，道義演辭在美國不受歡迎。」他們因此建議，針對全球而發的演講，應求簡短達意，並具有政策說明。⁸³ 藍欽大使也曾建議華盛頓，鼓勵蔣中正將臺灣建設為「民主

化學社，2024年），1956年1月29日，頁35。

⁷⁹ 蔣廷黻著，張淑雅等編校，〈蔣廷黻日記/1953-05-15〉、〈蔣廷黻日記/1955-06-06〉，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2024/8/24點閱）；外交部後續策畫「廣案」，分成「廣子」、「廣丑」、「廣寅」三項子案，以在美宣傳計畫、在臺配合對美宣傳、邀請美國人士來華為工作重點。

⁸⁰ 〈重要聲明（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6-00003-009。

⁸¹ 蔣廷黻著，張淑雅等編校，〈蔣廷黻日記/1955-08-28〉，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蔣廷黻日記（2024/8/24點閱）。

⁸² 陳冠任，〈1950年代中華民國對美宣傳政策的形成與轉變〉，收入呂紹理、唐啟華、沈志華主編，《冷戰與臺海危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頁408-432。

⁸³ 〈廣案（加強對美宣傳）〉，《外交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館藏號：707.5.0060。

櫥窗」，顯然支持這群臺灣外交官表達想法。⁸⁴ 如果用研究者分析的宣傳論點，外交官員此時意見已趨向於國民黨宣傳單位集體研討得出的「自立論」，選擇對具體行動保持曖昧。至於在宣傳方略上，去淡化蔣中正主張的「反攻時間表」，要到1958年八二三砲戰期間簽訂《蔣杜聯合公報》，明確限縮中華民國政府主動發起武力反攻，為減低立即傷害，始有所轉變。⁸⁵ 葉公超在行動上的避免表態及「保持現狀」的策略，自然和蔣中正在行動上傾向於積極表態、打破現狀的觀點產生衝突。

此外，葉公超對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在黨內實施之「黨員自清」也不以為然，無形間展現民主優先於「擁蔣」，更為加深其與蔣中正之間的理念差異及信任危機。據稱，葉公超收到「黨員自清」表格後，曾親手寫下千餘字信件，動念準備退黨。葉公超自稱，從青年時期就在美國芝加哥加入國民黨，黨齡資深。他的反感，正因認為：國民黨推動「黨員自清」的作風，就代表採取與共產黨相同的作法。現在《外交部》檔案中，保有葉公超在1955年12月28日以「中央直屬區黨部第三小組黨員葉公超」具名致「孟鄰〔按：蔣夢麟〕組長」的手書。葉公超在信中，先以未曾收到第一次黨員自清運動資料，當面對所謂「第二次黨員自清運動」文件，回復資料計算時間究竟由何時起算、包含留居中國大陸境內親友立場關係該計算至幾親等諸技術關鍵點相詢，展現他對於文字意涵精確性仔細斟酌的學者本色。葉公超在長達40頁的信函中表達個人自由派政治理念，在於他明確指出自清運動的四大可能弊害：「（一）有損於本黨內部之團結，（二）無助於我反共力量之增強，（三）違反本黨之主義與基本精神，（四）損及本黨之聲譽」。葉認為填報文件時，有可能會因為定義不清而導致填寫疏漏，可能會被有心人視為「心虛或欺瞞」，甚或因不敢提出異議而敷衍了事、應付上級，這樣將無助於國民黨的內部團結。他認為黨對於黨員實應給予一定的信賴與尊重。葉更在信末建議，填報資料應該限縮用途，不得作為考核依據，也不宜憑填報資料作為黨員同志檢舉告密之基本參考資料；實施程序不明之處，更應以後續說明文件

⁸⁴ 張淑雅，〈藍欽大使與年代的美國對臺政策〉，《歐美研究》，第28卷第1期（1998年3月），頁207。

⁸⁵ 林果顯，〈兩次臺海危機的戰爭宣傳佈置（1954-1958）〉，收入呂紹理、唐啟華、沈志華主編，《冷戰與臺海危機》，頁355-360、368。

予以補充。同函並檢附了《自由中國》的相關社論。⁸⁶ 儘管葉公超最後持續列名國民黨宣傳指導委員會成員、第八屆中央評議委員，⁸⁷ 不過，葉公超在手書中的表述已經呈現和蔣中正之間的政治理念差異。

1958年內閣改組，因學界「南北之爭」及政壇流言，引發行政院長陳誠換下教育部長張其昀（「南派」學人），蔣中正為此遷怒陳誠、胡適及陳雪屏。⁸⁸ 外間的流言指稱葉公超參與干預陳誠內閣人事，也引發蔣中正不滿，欲撤去其外交部長職，經陳誠力爭後，改為葉出使美國，改由黃少谷擔任部長。葉使美後，也傳出他與宋美齡的不睦。⁸⁹ 葉曾向傅秉常透露，蔣中正、陳誠確曾因人事爭執，讓他與黃少谷夾在雙方之間，造成溝通困難。⁹⁰ 據記載，黃少谷在外交部長任內如遇重大事項，即頻繁密電葉公超，尋求妥善解決之道，⁹¹ 反映葉公超仍能高度參與外交政策機務，以及黃少谷的過渡性質。

總而言之，蔣中正與葉公超之間的外交歧異與信任危機，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蔣中正對外交官的獨特要求、對美國的不信任，以及掌控權力的欲望，都與葉公超在學人矜持、外交理念，及對國際局勢在知識專業的務實判斷中產生衝突，而這些都為葉公超離開外交的工作前線埋下伏筆。

⁸⁶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一）》，頁383；〈葉公超部長手稿有關「國民黨自清運動」及對「和平共存」一書意見〉，《外交部》，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典藏號：A303000000B/0044/804/0016/0001。

⁸⁷ 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頁291、294；楊西崑提及，有外籍人士將和葉公超談話時，對國民黨、蔣中正批評的內容報告予蔣，讓蔣中正頗為生氣，在國民黨九全大會予以批評，認為污蔑國民黨及領導人。考量事發時間點，顯示葉公超卸職後難掩悲憤情緒。楊西崑口述，劉鳳翰、陳進金訪問，楊同慧記錄整理，《楊西崑先生訪談錄》，頁121-122。

⁸⁸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8）》（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1958年7月7-9日，頁180-181。

⁸⁹ 傅秉常著，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民國四十七—五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年），1959年1月16日，頁69。

⁹⁰ 傅秉常著，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民國四十七—五十年》，1961年11月16日，頁606。

⁹¹ 周谷，《外交秘聞：一九六〇年代臺北華府外交秘辛》（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年），頁147。

肆、蔣、葉互動轉折

在1958年6-7月的行政院人事異動後，有政界人物的紀載稱，外交界和司法界一樣，都得注意多做事，少講話，稱葉公超「講話稍多，實則彼人極聰明能幹，苟能稍再加以修養，成就必定更大云云。」⁹² 政界人士顯然預料到葉公超話「說多了」，會影響蔣中正的觀感，進而影響其前途。

蔣中正針對1958年簽訂《蔣杜聯合公報》的文字內容與因應，更透露出他對葉公超的疑慮。蔣的腹案是，主張臺灣擁有緊急自衛權與報復權，美國協助充實金馬防衛力量，且同意不阻礙臺灣促成大陸反共革命的形勢。10月22日會談時，杜勒斯拿出預擬說帖，蔣當下聽到葉的讀解，情緒激動但「忍之又忍」。因為蔣中正不能公然發火，只能在聲明中表示：「決不願為求得國際姑息主義者之同情，而喪失大陸同胞之自由希望」，並保留有關往來原件，作為「此一重大困難與苦痛交涉之經歷與教訓也」。於是，在《蔣杜聯合公報》英文重修稿中，將「憑藉」一詞改為「使用」，然而在公報英文先行公布的情形下，已無法再作更改（此為蔣慣用手法）。蔣中正當下自稱，覺得「不憑藉武力」改為「不使用武力」有所不妥，既已無法更改，則必須轉念以自我開解。沈劍虹回憶，當蔣質問葉公超有關英文翻譯，葉走出辦公室時「表情凝重」。⁹³ 事實上，官方重述「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以及9月底強調「反攻的基地在大陸的人心」和公報所稱「非憑藉武力」並不相違。蔣中正事後將怒火傾注於葉公超，進而指責葉「如此欺主，無異賣國，殊堪痛心，但此木已成舟，對之亦無可奈何，惟有忍之，須知其為何如人也。」在當週反省錄的紀載中，可知蔣中正尚不敢確定葉公超是有意或無意，「應在將來再加證明，然余尚不疑其出於有意也。」⁹⁴ 蔣中正的多疑心

⁹² 傅秉常著，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民國四十七—五十年》，1958年12月31日，頁57。

⁹³ 沈劍虹推論，該事是蔣中正動搖信心的前奏說法，當因不知1955年「不敢譯」前因的推論，可以佐證統治者對翻譯的信任危機與共情效果的影響。秦賢次編，《葉公超其人其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頁127。

⁹⁴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58）》，1958年10月18日-24日，頁261-266。

思更趨加深，就待其他事件激化。中華民國政府原以為《蔣杜聯合公報》是一項外交成功，然而，美國後續的宣傳操作及媒體報導，卻導致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其已「放棄反攻」，外交成果遂轉為宣傳挫敗，並對基本國策構成挑戰。⁹⁵ 此一事件顯然成為蔣、葉關係轉折的關鍵。

1959年9月9日，王世杰（時任陳誠內閣政務委員）與蔣廷黻、胡適會談時，胡適提及葉公超有關私函大要：「謂華府之美國友人，對於〔於〕蔣先生之連任，率不贊同；彼意以為如蔣先生決定連任，則須先作幾種可以滿人期望之事。」⁹⁶ 葉公超信中內容對照陳誠關注的施政項目，可能包括控制預算、改善軍公教生活、調整軍費運用等。⁹⁷ 葉公超、蔣廷黻在1959年間已認為蔣有意三連任。⁹⁸ 葉公超和胡適反對蔣中正總統三連任的意向相符，也讓蔣對反共政治自由派學人的不滿情緒更為擴散。

蔣中正最終在1961年決定解除葉公超駐美大使職位，不准其返美交接。1961年4月間，葉將美國「兩個中國」的想法帶回臺灣，遭蔣斷然拒絕。外交部給予蔣廷黻訓令，傳達堅決反對任何以「兩個中國」辦法處理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擬議，是蔣中正的慣用語。⁹⁹ 5月初，蔣收到張其昀轉來的曹文彥密報，稱要防備葉公超可能成為「吳國楨第二」，蔣藉機斥責懂外語者成為「美國買辦」：

⁹⁵ 張淑雅，〈「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宣傳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2010年12月），頁29。

⁹⁶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1959年9月9日，頁900。

⁹⁷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1958年1月7日、2月13日、7月4日，頁806、829、902；1959年9月4日，蔣中正約見王世杰時，問及臺灣一般情形意見，曾表示減少兵員、培植重用臺灣本省人才兩事之重要。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1959年9月4日，頁899。

⁹⁸ 蔣廷黻著，張淑雅等編校，〈蔣廷黻日記/1959-4-25〉，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蔣廷黻日記>（2025/2/25點閱）；傅秉常著，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民國四十七—五十年》，1959年10月9日，頁190；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60）》（臺北：國史館，2024年），1960年2月1、4日，頁57、60-61。

⁹⁹ 江勇振，《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頁497。

葉某之奸滑言行，當不出於我意想之中，而其對我之污辱，其愚昧狂妄至此，殊出意外，好在發覺尚早，猶有準備之時間。惟其投機成性，如政府勢力強固，彼當不敢叛變，但應切實戒備，如我略有弱點予以可乘之隙，則其推波助瀾出賣國家，成為吳逆第二，乃意中事。十年來更覺文人之無德妄為，毫無國家觀念之可痛，而留美之文化賣辦，凡長於洋語者，無不以一等奴隸自居為得意，可悲極矣，應切記之。¹⁰⁰

這可視為1958年學界「南北之爭」的後續延燒。葉公超身為北方學人群體之一的從政者，受到「南北之爭」、「潛在美國買辦」雙重效應影響，在蔣中正心目中印象更趨負面。在曹文彥的密報之外，其他管道（例如立法委員倪文亞）也密報葉公超建議訪美人物言談「少提黨及總統」，促使蔣中正「誤會」，¹⁰¹ 加深對葉的不信任感，也不容忽視。

1961年中華民國與美國為外蒙問題不斷交手，葉公超轉達美國政治立場，恰好顯示葉身為美國政策優秀翻譯者的同時，無意間陷入在國內政治運作中以及執政者心目中的「危險」，最終造成葉氏官場前途的總清算。¹⁰² 1961年8月23日，蔣中正收到葉公超電陳有關外蒙入聯合國的辦法意見，惹惱蔣中正，痛斥其「真為漢奸賣國之所為，可痛，此奸不除必為國患也。」此後蔣中正日記以「漢奸」、「葉逆」書寫、指稱，可謂1961年蔣、葉互動轉折關鍵。葉公超的彈性務實態度，在蔣中正眼中卻成為動搖反共國策的危機，甚至其有借美國力量威逼之嫌，引發蔣中正的權力防衛心理，因此藉由指責葉公超的忠誠度作為心理防衛機轉。外交部長沈昌煥為貫徹蔣中正使命，親自赴美督鎮，要求駐美、聯合國人員

¹⁰⁰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61）》（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1961年5月1日，頁117。

¹⁰¹ 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61）》（臺北：國史館，2024年），1961年11月11日後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頁344-345；陳誠著，林秋敏、葉蕙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1963年10月30日、11月4日，頁1822、1824-1825。

¹⁰² 林孝庭，〈1961／對美外交轉危為安〉，收入呂芳上主編，《尋找自己的蔣中正II：1955-1972年日記解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頁103。

遵循指令，¹⁰³ 這使得遵從蔣命的沈不免和一線執行人員葉、蔣關係也變得緊張。葉公超負責溝通，為了與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彭岱（McGeorge Bundy）建立直接聯絡管道，甚且不惜跳過國務院，為外交官員視為走險招。¹⁰⁴ 葉在10月間在談話中有不少批評美國語氣，經《中央日報》發表，讓傅秉常感覺「駐使照例不應批評駐在國之政策」。¹⁰⁵ 這並未改變葉公超身陷蔣中正信任危機的局面。

在張羣、王雲五的勸說及蔣經國的獻策下，蔣中正於外蒙入聯問題上大幅轉向，並在與美駐華大使莊萊德（Everett Drumright）會談時，透過張羣的建議，由許紹昌參與機要，將葉公超排除。¹⁰⁶ 蔣中正態度轉變，使得原先遵從蔣中正意向的沈昌煥，因無法對外、對立法院交代而提出辭呈。¹⁰⁷ 蔣中正遂將其對美方的不滿轉嫁至葉公超身上，迫使葉結束外交生涯。¹⁰⁸ 外交及政界對葉無法返回美國任所多不知情，¹⁰⁹ 而陳誠也無法讓蔣中正收回命令。¹¹⁰

¹⁰³ 〈一般資料——民國四十七年〉，《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354-033；〈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八）〉，《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200-00665-079；蔣經國也曾表示，外交官員挾美威逼感，必須防範。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61）》，1961年10月8日，頁310。

¹⁰⁴ 此為劉錫的評論。傅秉常著，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民國五十一年—五十四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年），1962年4月18日，頁72；沈昌煥也提及國務院對葉公超「有意見」，蔣廷黻著，張淑雅等編校，〈蔣廷黻日記/1961-10-23〉，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s://taco.ith.sinica.edu.tw/tdk/蔣廷黻日記>（2025/2/25點閱）。

¹⁰⁵ 傅秉常著，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民國四十七—五十年》，1961年9月16日、10月16日，頁577、582。

¹⁰⁶ 王正華，〈蔣介石與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國史館館刊》，第19期（2009年3月），頁187。

¹⁰⁷ 〈中美關係（一）〉，《蔣經國總統文物》，典藏號：005-010100-00055-030。

¹⁰⁸ 〈石叻叢書續編—石叻文集〉，《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10109-00001-009；潘佐夫引史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說法稱，甘迺迪並不排斥「兩個中國」的理念，但沒有時間去根本地改變中國政策。Alexander V. Pentsov, *Victorious in Defe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iang Kai-shek, China, 1887-197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467.

¹⁰⁹ 黃杰著，廖文碩、陳昶安、李仕寧編輯校訂，《戰後臺灣史料與研究：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五·民國五十年六月～民國五十一年二月》（臺北：國史館，2023年），1961年10月20日、11月8日，頁337、382。

¹¹⁰ 陳誠著，林秋敏、葉蕙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1961年10月

葉公超返臺後，續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直至1978年5月底卸任，¹¹¹ 非如蔣中正原本1961年10月21日仿效處理孫立人前例，準備由「行政院派為顧問」，「令其自反自新，安分修養」的處置，實為陳誠堅持加上張羣居間協商所致。張羣在陳誠、蔣中正之間居間協調，利用蔣中正擁有葉公超受陳誠收編的先入為主印象，使蔣顧慮到陳誠的換人疑慮，為求「安內」選擇局部妥協，同意陳誠提出「政務委員」人事安排。¹¹² 蔣中正內心則仍視葉公超為接受懲戒者，故日後方有派遣張羣出面警告葉公超，不可在外活動，並拒絕保留其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頭銜。¹¹³ 蔣經國在相信、支持蔣中正立場下，1960-1968年他對葉公超的敘述多直呼其名並持負面觀感。¹¹⁴ 若觀察蔣經國的日記，他受到父親信任託付秘密交通管道重責，並未書寫對葉公超不利內容，事後立即稱，奉父命辦外交事務，傳達雙方意見始終堅持「一句不漏、一句不加不減」的原則，他受記憶力衰退影響，已需仰賴隨筆輔助，考量蔣中正批閱特性言，有關話語不能排除在有感而發，以及迎合蔣中正心意的成分。¹¹⁵ 再輔證以蔣廷黻接替駐美大使職，拜會行程表現也是小心翼翼，¹¹⁶ 都可視為受葉公超事件餘波的外顯表現。儘管蔣中正最終對外蒙古

27-28日、10月28日後上星期反省錄，頁1441-1443。

¹¹¹ 《總統府公報》，臺北，第3362期，1978年5月31日，頁2。

¹¹²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61年）》，1961年10月21日，頁265；阮大仁，〈由蔣中正日記去看葉公超大使去職之經緯——「侮辱政府」、「奸詐欺騙」、「賣國漢奸」三罪併發（一）〉，《傳記文學》，第96卷第6期（2010年6月），頁14。

¹¹³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主編，《蔣中正日記（1963年）》（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1963年2月26日、11月23日後上星期反省錄，頁58、292-293。

¹¹⁴ 蔣經國書寫文字較多的負面批評，諸如透過倪文亞、沈昌煥談話知道，葉是「漢奸思想」的代表者，和蔣廷黻都是「媚外、驕橫」。葉放言批評政府，「對自己的過失無不掩護」，是「弄巧成拙」等。最後批評葉是「失意政客」之一。分見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61）》，1961年11月11日後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11月12日，頁344-345；同著者、編輯校訂者，《蔣經國日記（1962）》（臺北：國史館，2024年），1962年9月1日前本月大事預定表，頁283；同著者、編輯校訂者，《蔣經國日記（1968）》（臺北：國史館，2024年），1968年3月19日，頁117-118。若考量蔣經國書寫日記會受父親蔣中正閱覽、批示，其有可能迎合父親的好惡視角去書寫。

¹¹⁵ 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61）》，1961年11月11日後上星期反省錄，頁344。

¹¹⁶ “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Bundy),” (March 12, 1962),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加入聯合國一案不行使否決權，符合葉公超傳達的美國政策。蔣中正內心卻對此舉視為弱國蒙受的恥辱、感到憤慨，不過，其外交政策逐步走上更趨保守的路線也終成事實。¹¹⁷ 蔣中正在外交事務方面和反共政治自由派學人間的互動趨於疏離，也和國內政治局勢表現相符。

葉公超儘管退出外交前線，因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主持行政部門涉外跨部門法案審查，在政治人脈外尚須廣博的專業知識、涉外經驗，對內部督導政務有所付出。諸如1962年8月16日，行政院第777次會議處理國內翻印英文書籍對外銷售問題，葉主持協調會後，建議行政院重申1959年8月取締禁令，並依循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於1960年公布的規定，以管制輸出類貨品原則處理。外交部門也應向美國說明執行情況；並與美方協調通知其美援雇員尊重臺灣禁令，不予攜出。臺美雙方就相關情報進行交流。內政部、教育部也應勸說國內書商和美國出版商協議發行臺灣版，申請註冊，以取得法律保護。但考量有關法令條件尚未完備，可先行暫緩加入國際版權公約。¹¹⁸ 葉公超也在嚴家淦行政院長任內，處理「高雄加工出口區組織條例草案」審議，並和董文琦、連震東主持有關高雄加工出口區有待改善問題之跨部會研究與審查會，進行協商。¹¹⁹ 因此，葉公超針對具跨國合作性質的經濟事務仍有與聞、獻替，在對外經濟決策扮演隱性角色。他出身學術界並心繫教育，為協助臺灣聖公會創設新埔工業專科學校（現聖約翰科技大學）而出任學校董事，協助募款，獲得美國「國際基金會」每年3萬元捐款，1970-71年間暫代該校董事長，並為該校募得款項興建校舍。¹²⁰ 這都成為葉公超的實績。

FRUS, 1961-1963, Northeast Asia Vol. 12, (Washington, D.C.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p. 194.

¹¹⁷ 王正華，〈蔣介石與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國史館館刊》，第19期（2009年3月），頁188。

¹¹⁸ 〈行政院會議議事錄 臺第一九九冊七七三至七八〇〉，《行政院》，典藏號：014-000205-00226-005。

¹¹⁹ 〈行政院會議議事錄 臺第二四三冊九二九至九三一〉，《行政院》，典藏號：014-000205-00270-003；〈行政院會議議事錄 臺第二七六冊一〇二五至一〇二七〉，《行政院》，典藏號：014-000205-00303-003。

¹²⁰ 〈降臨堂介紹〉，收錄於「聖約翰大學官網」：<https://chap.sju.edu.tw/Page/02-8.htm>（2024/12/16點閱）。

直到蔣經國1975年就任國民黨主席，始改變立場，轉而和緩對待葉公超。葉所督導的涉外經濟事務涉及中華民國經濟轉型發展，自令蔣經國未敢輕忽以對。蔣經國在日記中禮貌地稱之為「公超兄」、「公超委員」。1976年葉公超復任第十一屆國民黨評議委員，1981年由主席提名、經大會同意續任第十二屆評議委員。¹²¹ 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就職總統後，5月22日即聘葉為總統府資政。¹²² 蔣經國此舉可視為對葉公超釋放善意。直至1981年11月20日，葉公超在臺北病逝，蔣經國在告別式當日親臨致悼。¹²³ 政治理念及人際是非，均歸塵土。

伍、結論

本文探討蔣中正與葉公超在外交事務上的互動，藉此剖析兩人從合作走向決裂的過程，反映出中華民國外交政策的轉變以及內部政治的發展趨勢。葉公超曾提及，無論是對日或對美談判，蔣中正皆擔任外交部長，宋美齡擔任政務次長，自己始終擔任常務次長。¹²⁴ 這恰好突出蔣中正欲掌控外交主導權，宋美齡獲得信任的態勢。蔣中正在日記中亦展現出他對外交事務具有高度的掌控欲，並將葉公超視為執行者，其評斷標準在於是否忠實執行他的指令。葉公超在現實中的穿針引線，其實更貼近政務次長的角色，因此自述自己是「常務次長」，或帶有幾分玩笑及自嘲意味。但是，葉公超的語言內涵，已經體現一位外交幕僚的才智與觀察力，以及其在現實政務中所扮演的關鍵作用。

¹²¹ 蔣經國稱呼，見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74）》（臺北：國史館，2023年），1974年4月25日，頁117；同著者，同編輯校訂者，《蔣經國日記（1975）》（臺北：國史館，2023年），1975年5月31日，頁148；同著者，同編輯校訂者，《蔣經國日記（1977-1978）》（臺北：國史館，2023年），1977年10月6日，頁163；國民黨榮銜見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頁357、375。

¹²² 《中央日報》，1978年5月23日，版3；王紹堉，〈葉公超與沈昌煥〉，《傳記文學》，第80卷第1期（2002年1月），頁13。

¹²³ 〈蔣總統悼祭葉公超 兩千餘人致輓〉，《中國時報》，臺北，1981年12月2日，版3。

¹²⁴ 秦賢次編輯，《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頁265。

葉公超是一位持反共立場的政治自由派學人，執行外交事務時，始終以維護國家利益為首要考量。他深諳美國民情及語言，在翻譯與理解訊息方面均扮演關鍵角色，得以分析相關利弊得失，協助中華民國的黨政軍領袖精確地理解美國政策及意向，做出適當回應，藉此維繫與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之連結，避免中華民國陷入外交孤立。

然而，蔣中正與葉公超在外交理念及對美觀感上存在顯著差異，這也為日後二人的衝突埋下了伏筆。透過蔣、葉關係的發展，本文觀察到：

一、蔣中正的權衡與妥協：儘管蔣中正在情緒激昂或與美方討價還價未果時會感到惱火，但會在維護政權利益的前提下盱衡全局，對美國做出善意回應及行動。這顯示蔣中正並非一味強硬，而是會在現實考量下做出策略性調整。

二、蔣中正的「安內」策略與人事安排：蔣中正面臨內部政治壓力時，會先採取「安內」策略，在人事任命上，於達成主要目的後，選擇接受局部妥協。例如，他先任命沈昌煥擔任外交部次長，再伺機升其為部長；1961年葉公超卸任返國後，亦安排其擔任其他職務。這些人事安排既展露蔣中正的權力運作手腕，也顯示其在必要時的彈性處置。

三、蔣中正對外交人才的觀點：蔣中正曾在日記中表示，他始終將培育新外交人才視為建國要務之一，並批評清廷及北京政府的外交官多為「洋奴」，只知迎合外國意旨，缺乏國家觀念。此番言論反映出蔣中正對傳統外交體系的不滿，以及其對具備自主意識及國家認同的新外交人才的期許。

葉公超作為外交事務的翻譯及溝通者，其與美國的「共情」表現，也無可避免地使其面臨信任危機。1955年金馬撤軍爭議即為一例，葉對美國立場的理解與傳達，無意間加深蔣中正的疑慮。1958年葉公超又在《蔣杜聯合公報》中將「不憑藉武力」翻譯為「不使用武力」，更進一步加深蔣對他的不信任，印象逐漸轉惡。

1961年，臺美雙方就外蒙入聯及中華民國代表權問題進行交涉期間，葉公超如實翻譯及傳達美國國務院的立場。然而，葉公超草擬的行動方案與蔣中正的最初意向及策略有所出入，更加深蔣中正對他的疑慮。儘管蔣中正最終透過二軌管

道確認並遵循美國意向，在聯合國表決中不行使否決權，葉公超卻成為他發洩不滿的對象。外蒙入聯事件成為蔣葉互動中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加速葉公超離職。

透過蔣中正與葉公超這一政治自由派學人的互動，我們可以觀察到，雙方在政治理念及對美外交觀感上存在顯著差異。當政治自由派學人從政，在堅持民主反共立場下期望維護中華民國政權，並主張彈性親美政策，且此一政策與蔣中正的利益及意向相符時，雙方尚能朝共同方向前進。然而，一旦蔣中正希望擺脫美國在軍事及外交管道上的控制，甚至不惜走向孤立路線以追求外交自主時，雙方的政治理念歧異便會浮現並且放大，與反共政治自由派學人主張彈性親美，傾向民主反共先於「擁蔣反共」的立場產生嚴重衝突。當蔣中正認為無需再忍耐時，反共政治自由派學人無法站在政治前線，便成為必然結局。

總而言之，蔣中正主導外交人事變動，不僅反映蔣的外交策略思路，更是當時中華民國內部政治趨勢的縮影。葉公超的案例深刻地呈現出，在複雜的國際局勢及國內政治環境下，反共的政治自由派學人從政，在追求國家利益與個人民主自由理念之間的掙扎與困境。葉公超既是才華洋溢的外交家，也是掙扎於時代洪流的個體，其經歷、理念均值得後人深思。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外交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廣案（加強對美宣傳）〉。

《外交部》（新北，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葉公超部長手稿有關「國民黨自清運動」及對「和平共存」一書意見〉。

《行政院》（臺北，國史館藏）

〈行政院會議議事錄 臺第一九九冊七七三至七八〇〉。

〈行政院會議議事錄 臺第二四三冊九二九至九三一〉。

〈行政院會議議事錄 臺第二七六冊一〇二五至一〇二七〉。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臺北，國史館藏）

〈董顯光〉。

〈葉公超〉。

《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石叟叢書續編——石叟文集〉。

〈總裁革命理論與實踐（四）〉。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一般資料——民國四十七年〉。

〈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三）〉。

〈一般資料——各界上蔣經國文電資料（十八）〉。

〈重要聲明（三）〉。

〈革命文獻——美政府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經過〉。

〈對美國外交（九）〉。

〈對美關係（一）〉。

〈對美關係（五）〉。

《蔣經國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中美關係（一）〉。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二、史料彙編（含日記、回憶錄）

陳鵬仁主編，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非常委員會及總裁辦公室資料彙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

廖文碩編輯，《美國國家安全與對臺政策檔案選譯（一）：杜魯門至艾森豪時期（1947-1961）》。臺北：國史館，2023年。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as FRUS), 1950,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 *FRU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6, Part. 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 *FRU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 14, Part 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三、工具書

王文隆編輯，《沈昌煥先生年譜簡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23年。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劉維開編輯，《中國國民黨職名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

四、日記、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吳忠信著，王文隆主編，《吳忠信日記（1949）》。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年。

吳忠信著，王文隆主編，《吳忠信日記（1950）》。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1年。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

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

- 陳克文著，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二）》。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
- 陳誠著，林秋敏、葉惠芬、蘇聖雄編輯校訂，《陳誠先生日記（三）》。臺北：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
- 傅秉常著，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民國三十七—三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年。
- 傅秉常著，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民國五十一年—五十四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年。
- 傅秉常著，傅錡華、張力校註，《傅秉常日記：民國四十七—五十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9年。
- 黃仁霖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黃仁霖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4年。
- 黃杰著，廖文碩、陳昶安、李仕寧編輯校訂，《戰後臺灣史料與研究：黃杰任職警總時期日記·五·民國五十年六月～民國五十一年二月》。臺北：國史館，2023年。
- 楊西崑口述，劉鳳翰、陳進金訪問，楊同慧記錄整理，《楊西崑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24年。
- 熊式輝著，林美莉校註，《熊式輝日記（1931-193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22年。
-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總編輯，《蔣中正日記（1949）》。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
-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總編輯，《蔣中正日記（1950）》。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
-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總編輯，《蔣中正日記（1951）》。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
-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總編輯，《蔣中正日記（1952）》。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
-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總編輯，《蔣中正日記（1953）》。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
-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總編輯，《蔣中正日記（1954）》。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3年。

-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總編輯，《蔣中正日記（1955）》。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
-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總編輯，《蔣中正日記（1956）》。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
-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總編輯，《蔣中正日記（1957）》。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
-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總編輯，《蔣中正日記（1958）》。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
-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總編輯，《蔣中正日記（1961）》。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
-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總編輯，《蔣中正日記（1963）》。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
- 蔣中正著，呂芳上、源流成總編輯，《蔣中正日記（1966）》。臺北：國史館、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
- 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61）》。臺北：國史館，2024年。
- 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62）》。臺北：國史館，2024年。
- 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68）》。臺北：國史館，2024年。
- 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74）》。臺北：國史館，2023年。
- 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75）》。臺北：國史館，2023年。
- 蔣經國著，歐素瑛、張世瑛、廖文碩、陳昶安、陳梅萱編輯校訂，《蔣經國日記（1977-1978）》。臺北：國史館，2023年。
-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7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8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9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11分冊》。北

京：中華書局，1990年。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 第12 分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五、報紙、期刊、政府公報

《中央日報》，臺北，1949-1978年。

《中國時報》，臺北，1981年。

《國民政府公報》，南京，第2781號，1947年。

《總統府公報》，臺北，第3362期，1978年。

六、專書

王宏志，《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年。

江勇振，《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1年。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著，趙妍杰譯，《翻譯的危險：清代中國與大英帝國之間兩位譯者的非凡人生》（*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24年。

周谷，《外交秘聞：一九六〇年代臺北華府外交秘辛》。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年。

林博文，《1949石破天驚的一年》。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09年。

秦賢次編輯，《葉公超其人其文其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再版。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衛城出版，2011 年。

張瑞德、馮啟宏，《蔣介石的人才庫與現代中國的命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4年。

湯晏，《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臺北：衛城出版，2015年。

戴鴻超，《槍桿、筆桿和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15年。

Pentsov, Alexander V. *Victorious in Defeat: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iang Kai-*

shek, China, 1887-197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七、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王文隆，〈沈昌煥與中法斷交（1963-1964）〉，收入中國近代史學會主編，
《老臣謀國：紀念沈昌煥先生逝世20周年研討會實錄》。臺北：秀威資訊科
技公司，2019年。

王正華，〈蔣介石與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案〉，《國史館館刊》，第
19期（2009年3月）。

王正華，〈蔣介石與196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國史館館刊》，第21期
（2009年9月）。

王紹堉，〈葉公超與沈昌煥〉，《傳記文學》，第80卷第1期（2002年1月）。

李君山，〈抗戰前期國民政府軍火採購之研究（1937-1939）：以楊杰在俄法之
工作為主線〉，《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2期（2014年11月）。

李戡，〈何世禮與《中日和約》的簽訂——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的角色〉，《國
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9期（2018年5月）。

阮大仁，〈由蔣中正日記去看葉公超大使去職之經緯——「侮辱政府」、「奸
詐欺騙」、「賣國漢奸」三罪併發（一）〉，《傳記文學》，第96卷第6期
（2010年6月）。

林正義，〈「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其對蔣介石總統反攻大陸政策的限制〉，
《國史館館刊》，第47期（2016年3月）。

林孝庭，〈1961／對美外交轉危為安〉，收入呂芳上主編，《尋找自己的蔣中正
II：1955-1972年日記解讀》。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2024年。

林果顯，〈兩次臺海危機的戰爭宣傳佈置（1954-1958）〉，收入呂紹理、唐啟
華、沈志華主編，《冷戰與臺海危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2010年。

張淑雅，〈「主義為前鋒，武力為後盾」：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宣傳的轉
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2010年12月）。

張淑雅，〈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一九五〇年代中美結盟過程之探討〉，
《歐美研究》，第24卷第2期（1994年6月）。

張淑雅，〈藍欽大使與年代的美國對臺政策〉，《歐美研究》，第28卷第1期
（1998年3月）。

陳冠任，〈1950年代中華民國對美宣傳政策的形成與轉變〉，收入呂紹理、唐

啟華、沈志華主編，《冷戰與臺海危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

黃克武，〈胡適、蔣介石與1950年代反共抗俄論的形成〉，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第一冊：領袖的淬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

黃克武，〈蔣經國與胡適：從「一黨專政」到「自由民主」的激盪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轉型〉，《國史館館刊》，第76期（2023年6月）。

葉公超，〈懷念董顯光先生（選載）〉，《傳記文學》，第42卷第1期（1982年1月）。

葉崇德，〈憶先兄葉公超〉，《傳記文學》，第55卷第6期（1989年12月）。

八、學位論文

黃淑薰，〈葉公超與劇變時期的中美關係（1949～1961）〉。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羅文婷，〈葉公超與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外交（1949～1961）〉。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九、網路資料

〈降臨堂介紹〉，收錄於「聖約翰大學官網」：<https://chap.sju.edu.tw/Page/02-8.htm>（2024/12/16點閱）。

〈葉公超〉，收錄於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https://gpost.lib.nccu.edu.tw/>（2024/8/16點閱）。

「戰後臺灣歷史年表——網路版」：<https://twstudy.iis.sinica.edu.tw/Twht/General/MPeopleTwht.php?People=葉公超>（2024/10/26點閱）。

蔣廷黻著，張淑雅等編校，《蔣廷黻日記》，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蔣廷黻日記（2024/8/22、2024/8/24、2024/12/21、2025/2/25點閱）。